

好的教育，就是神奇的照亮

张丰

有位在北京工作的朋友，小时候在山西农村生活。她读的小学，有一年从县城来了一位漂亮的女老师。朋友是课代表，要把同学们的作业收完，送到老师办公室。她进去的时候傻眼了：美丽的老师，正在和一个小伙子手拉手，转圈，跳舞。

“老师是在恋爱”，很多年后朋友回忆起来那一幕，仍然有点兴奋。一个小女孩，被眼前的一幕照亮了。在她看来，这个外来的老师，拥有和其他老师不同的气质——谈吐，走路，哪怕是“爱情”，都代表着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后来，这位朋友从山西考到了北京大学。

我也有相似的经历。读初中的时候，学校来了两个年轻的男教师，他们是从一个师专过来实习的，老家在焦作。虽然都是河南，但还是相隔了两三百公里。他们的豫西方言，和我们豫东平原不同，听起来仿佛要洋气一些。很多时候，他们会直接讲普通话，在我们学校，根本没有讲普通话的老师，不管是课上还是课下。

现在想来，他们不过是中师毕业的小伙子，十七八岁而已，来到我们这个镇上，也很忐忑吧。他们穿着运动服，很有可能是没有别的衣服可穿，但是在我们看来却是时尚的象征。我们从没穿过校服，更谈不上运动服，脚上都穿着母亲做的布鞋。

作为教师子弟，我对老师早就没什么神秘感了。从小就认识很多老师，在他们的爱、调侃和哄笑中慢慢长大。我知道教师很伟大，有自己的“节日”，但是也知道他们都是普通人，我父亲做的饭菜，就常常难以下咽。他也会找个借口，把洗碗这样的家务分配给我们。同学们看到老师都是仰望，而我却从来没有这样的尊崇和神秘感，那就是我每天都能看到的生活啊。

“

教育需要的是不断的“陌生化”，需要展示新的场景和可能性。回想起来，自己经历了那么多老师，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其实都和“教学”无关，而是一些神奇的暗示或者力量

但是这两个穿运动服的、讲普通话的小伙子却重新让我对“教师”这个职业产生了陌生的感觉。教师应该是有追求的（穿运动服而不是我们的居家服装），应该是讲普通话的，那意味着和一个更高级的标准、一个更大的世界联系起来。那时还没法看电视，但是已经通过收音机知道普通话是怎么一回事，有了“国家”和“乡土”的模糊区分。

这样的老师，未必真的传授过你知识，但却为你召唤出一个新世界。那两个实习教师，就没有给我上过课。但是，他们的存在本身，就足以召唤出一个广阔的世界，就像拽着你的头发，把你拔离了地球，脱离引力的掌控，找寻到飞翔的感觉。你的内心会有一种真正的觉醒，开始重新打量现实生活，你和现实产生一种疏离感，开始想要离开，去看那个更大的世界。

大概就从那时开始，我就知道自己一定会到远方去求学。

经常和两位实习老师一起打篮球的弟弟应该有相同的想法。那年寒假，有邻居开玩笑说要给弟弟介绍一个对象，才14岁的弟弟恼怒起来。他说：“我才不会在老家找对象。”父亲的眼睛亮了起来，他一定发现自己的两个儿子变了。

这可能是关乎到教育的一个本质问题：什么才是真正好的教育？一个孩子，每天随波逐流背着书包上学，做各种作业，应付考试，他一定需要一个特别的日子，需要一个决定性时刻来照亮自我。有时候人们会说，真正好的教育，是让人能够“发现自己，完善自己”，但是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这样的契机。

父亲可能不是特别好的老师，他教过的学生，也有考上北大清华的，他只会说“学习都要靠自己”。但是，我隐约感知到，父亲懂得教育的根本。我读初二的时候，父亲正好教这一年级的数学。我的数学很差，他有足够的理由把我调到他所教的班级。但是，父亲没这么做，他甚至都没有给我讲过一道数学题。

他一定知道，自己亲自教儿子，是错误的选择，教育需要的是不断的“陌生化”，需要展示新的场景和可能性。回想起来，自己经历了那么多老师，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其实都和“教学”无关，而是一些神奇的暗示或者力量。

读高三的时候遇到一个很厉害的语文老师。他总是懒懒的，对讲解语文题很是不屑，有时候会说“这个没什么意思”之类的话。但是，他的傲气和身上干净的白衬衫，却很神奇地鼓舞了我。在我看来，那就是才华的象征，也是一个读书人该有的样子。于是，我就发奋学习语文，差点把《古文观止》全部背诵下来。那位老师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他通过这种方式“照亮”了我。

汪永基

云高气爽，秋风得意。洛水之阳的这片黄土地上群贤毕至，高朋满座。学界期待已久的“纪念二里头遗址科学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河南洛阳二里头遗址如期举行。近年来，文明探源、夏商之辩、信史疑古与“最早中国”等学术前沿之争已蔓延学界之外，数据频出，成果硕硕。二里头文化高度传播，知名度爆棚的主要原因是在中国古史中是否存在夏朝。这种疑古现象或许超出了人们的常识。

对浩瀚的华夏文明史最常用的赞美之词莫过于博大精深与源远流长。1959年之夏，考古学家徐旭生依据《史记》在河南洛阳寻找“夏墟”时，在豫西地区偃师二里头村发现类似古代大型都邑遗址。依照“最具典型性”的夏文化特征，二里头遗址的发掘逐步显露出区别于之前史前龙山文化和之后信史中的商代文化，从而学界也开始了对二里头遗址是“姓夏”还是“姓商”的争论。

“信史”还是“疑古”的纷争在学界长期存在，喋喋不休，各领风骚。由于夏王朝的“信史”存在对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具有承前启后的特殊地位，北京大学教授邹衡发声：“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我国“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教授表示：“二里头遗址为夏代存在提供了可靠物证。没有二里头遗址，我国夏商周的年代框架就拿不出来。”一语千金，以《史记·夏本纪》为历史蓝本的记述成为学界认同的主流，遗址新的发掘材料也不断得到充实和证实，二里头遗址是夏王朝部分时期的都邑。

据古文献《竹书纪年》载：“太康居斟鄩，羿又居之，桀亦居之”。太康为大禹之孙，夏启之子，是夏朝第三代君王，因贪欲田猎，漠视民生等曾失国于东夷族后羿八年。“少康中兴”之后，其后帝予完成了迁都计划，回到斟鄩直至夏末帝夏桀丧国于商。史书记载夏都斟鄩有描述记载，指明在洛阳偃师洛河岸边。史料多有记载，斟鄩以国为氏，出自姒姓，为上古八大姓之一，由舜帝赐之禹为领治水之功德。姒姓的后代也包括费、邹、谭等姓氏，传流甚广。

关于夏王朝的争议在学界堪有“和而不同”之风。夏王朝由夏族所创立，或由分布甚广的夏民族聚落、城邦、联盟和都邑共称而。其向东与东夷族明争暗斗，扩张土地人口，实施化；向西与戎狄绥靖和亲，逐步形成夏文化，在古国与方国之间突显夏文明。夏王朝据载历经14代17帝，其先后在中原嵩山、阳翟、商丘等数个地区建都立业，广域王权。在夏王朝第十代帝泄期间，正式赐封九夷各个部落诸侯爵位，或开启完成统一中原及其周边地区的王朝天下。有史载，自大禹立夏，太康帝完成“家天下”格局，至于夏帝桀，夏族为华夏文明贡献了471年。

在著名考古学家许宏与袁靖合作编著的《二里头考古六十年》一书中，强调了对遗址出土人骨的整理、分类与研究有极大的遗憾，没有进行系统和科学的鉴定，导致相关人骨材料保存较差，人骨的形态学研究进展缓慢，对二里头遗址古代人群的体质特征和种族类型缺乏明晰的认知。在对遗址中人骨初步的体质人类学检验中，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期古代居民的体质特征较为一致，从大人种上属于亚洲蒙古人种，与现代华南地区的居民颇为近似。著名人类学家朱泓教授将这种类型命名为“古中原类型”。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这种类型的居民曾经广泛分布在新石器时代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包括考古学文化中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龙山文化和陶寺文化等地区的居民中。这种现象从侧面是否反映了夏王朝与夏文化一统华夏建立广域王权的同时，不同族属的人群开始华夏文化的认同。

时至殷商时期，根据安阳殷墟祭祀坑和中小墓两类墓葬出土人骨形态特征分析，殷商时期中原地区人群的体质特征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古中原类型、古华北类型、古东北类型和古华南类型。其中以接近现代东亚蒙古人种的古中原类型居民占绝对优势，这反映自夏代至殷商时期这一地区作为政治中心吸引了四面八方的人群来到这里构成了民族共同体与文化共同体。据有学者研究认为，二里头遗址所呈现的文化主体是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基础上吸收融合周边地区文化发展而来，在考古学文化上保持了连续性。有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单一民族创造的文化共同体，同时呈现了多元和多层次的文化繁荣。

著名的古史学者顾颉刚曾感慨：“河、洛之间为夏代政治中心自无疑义。所恨者，夏代史迹无文字可证明耳。”到目前为止，几代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都曾不得所以，抱憾终生。夏代有无文字的疑惑与争论已成为学界急切期待考古学新材料出现或新研究成果的出笼。曾经在全世界学术圈公认的常规中，文字的出现是文明的标志之一。为此，我国史学界及考古学界围绕文明进入的门槛争论不休，自圆其说，各有千秋。考古学家夏鼐曾有著名论述，明确指出夏文化应该是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由此而论，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的遗存属于不同性质的文化，而集中代表夏文化模式的二里头文化是否会有文字形态材料出土已成为学界期待的焦点。

有学者针对性指出，文字是记录和传达语言的文化工具，具有表形、表意、表音的功能。由于文字的起源、发生、成长与成熟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因此也是学界长期关注探讨和思考的重要学术问题。二里头文化的陶文或被认为是文字，或被认为是符号，在其文化区域内多有发现，字符表达不少于64种。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李维明认为，这些发现的字符多见象形，也见会意，存有文辞，同时具有属地、数量、日期、祭祀等寓意，符合文字超越时间空间的记录功用特征，当属于文字，其结论是：二里头文化骨刻辞性质属甲骨文字。据知，二里头文化碳14测年经多地测试公布，其文化年代上限逐次下调200年，大幅度压缩，使之前的薪炭文化扩充其中，出现夏代纪年新的格局。

华灯初上，夜幕降临。刚刚开馆的二里头夏都博物馆仍然人声鼎沸，灯火通明，络绎不绝，赞声贯耳。人们流连忘返于二里头文化的氛围之中，仿佛徜徉于夏都的陶、玉、骨、铜完美组合的框架里，尽情地吸吮华夏文明的精髓，感受着夏代的一体多元之光。

寻「夏」——里头

一路走好！“硬汉”从维熙

韩浩月

“老从今天早上走了”，当从维熙先生的好友、传记作家李辉10月29日在微信群里通报这一消息时，大家都觉得震惊与伤感。2018年《从维熙文集》出版的时候，在新闻发布会上他还朗诵诗歌、用美声高歌一曲，2019年也曾出席过公开活动，身体状况看上去不错，不像86岁的老人，也许这是因为大家愿意记得的，永远是那位爱喝酒、爱唱歌的“强壮”的从维熙。

从维熙的名字，长久地停留在中学时代的记忆里。这个名字像块石碑，遥远而又坚固——产生这样的印象，是他的作品与文字的缘故。前些年忽然觉得自己离这位文学前辈很近，是因为聚会的酒桌上，时常出现从维熙赠送的来自他家乡河北玉田的酒。酒都是李辉带来的，每次都会说“这是老从送的酒”，酒是坛装的，每坛两公斤，每次都会被喝光。喝多了“老从的酒”，便惦念着什么时候能敬他一杯，感谢这几年的赠酒之情。

2018年6月6日晚，是我们几个好友运营的“六根”公号开通四周年聚会，从维熙来了。网上他的生辰，只有年份显示是1933年，没有具体到几月几日，但那天有人给他准备了蛋糕，所以极有可能从维熙的生日是6月6日或者前后某天。现在回看那晚聚会的照片，发现他虽然满头白发，但精神良好，还握刀为众人进行了切蛋糕“剪彩”。那晚的从维熙有没有喝酒不记得了，但清楚地记得他高歌了一曲，用美声，这已经是他在聚会中的保留节目。

2019年2月，春节过后的一次聚会，从维熙再次出席，欢声笑语中他的兴致也颇不错。从当晚的合影看，拍照时他还与我们一起端起了酒杯，可能是端起又放下了没有喝，但曾经好酒之人的洒脱之气还是有的。有关从维熙喝酒，流传着这样一件事：1985年的时候，从维熙随一个作家代表团前往日本访问，遭遇到了有“酒鬼”之称的日本著名作家水上勉，两人从小杯喝到大杯，之后水上勉喝一杯从维熙喝三杯，直到把水上勉喝得甘拜下风、心服口服。第二天当地媒体报道称，“中国作家从维熙是征服东瀛的酒魔”，从维熙看到之后比发表了一

“

从维熙所经历的坎坷与磨难，都被他写进了小说与纪实文学当中，为读者留下了一个了解过去的窗口。同时，也反过来塑造了现实生活中的自己。他的不畏苦难，他的豪爽性情，何尝不是在表达一种生命态度，如果中国也有“硬汉派”作家的说法，从维熙当算一位

部小说还高兴。

2019年5月，第三次见到从维熙，是在画家罗雪村的画展上，从维熙在家人的陪同下前来参观。在画展上，他遇到了许多老朋友与新朋友，虽然话说得不多，但大家对他的尊重与关心，都是显而易见的。也就是在这次画展上，从维熙透露给李辉一个信息，他想把《大墙下的红玉兰》手稿捐赠给巴金故居，“我一听，心里非常感动。这部手稿珍藏至今的老从，将之赠送巴金故居，是多么了不起的情怀！”——李辉在文章里这样写道。李辉把手稿转交给巴金故居负责人，并请对方做一个精装本，当这本书的封面已经面世，新书将要印制出来的时候，从维熙离开了人世，没能看到新书，这是个遗憾。

《大墙下的红玉兰》是从维熙的代表作，这部小说的写作与发表，开创了新时期文学一个新的题材区域，也为从维熙带来了“大墙文学之父”的称谓。这部小说最早发表于《收获》杂志1979年第2期，按照从维熙的描述，《大墙下的红玉兰》是在《收获》杂志创始人之一巴金的坚持之下，编辑部才把它以最快的速度和头题位置发表出来的。《收获》杂志还发表过从维熙屡遭退稿的《远去的白帆》，后来这部小说以接近全票，获得了1984年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

说文学奖。巴金对从维熙的赏识，源自两位都是爱讲真话的人，从维熙的创作，从来都是属于“硬骨头”式的，晚年也是如此。

从维熙去世后，有许多的报道与纪念文章，也有他此前的一些文章被传播，其中有一篇是从维熙回忆1963年在北京南郊团河农场参加劳改时与潘汉年的交集：在河沟对岸，从维熙时常见到一位垂钓老者，凭借模糊的面相以及身影，从维熙觉得老者是潘汉年，他向农场办公室的人询问，得到的答案虽然似是而非，但更加确定了潘汉年的身份，从此他时常与垂钓老者隔河招手或者偶尔相视一笑。文章当中，有一段十分令人动心的描写——出于对潘汉年的敬仰，从维熙做了一个被他称为“十分出格”的行动：

“那是夏日采摘蜜桃的日子，组里成员都装运桃去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值班房，负责过秤等待汽车来拉走桃筐。就在这一瞬间，我看不见那位钓鱼老者正在树下发呆。这时我突发奇想，让那位比我心灵还要苦涩的前辈，也尝尝生活的甘甜。我从桃筐里挑选了两个熟透了的桃，先是想给他扔过去，但怕损伤了蜜桃的形状。想来想去，忽然计上心头，我想从值班室找来一个塑料盒子，再把两个桃放进盒子——我想如同放河灯那般，让两个寿桃漂浮到小河对岸。”

然而对岸老者的反应却是，“似乎看穿了我的用心，先是对我连连晃动他头上的草帽，然后便夹起钓鱼竿匆匆离开了河沟对岸。”这样一个简单的情节描写，充满了书生意气与文人的表达，有着孩子气的天真，但读了之后却心受震动，让人有想流泪的冲动。一河之隔，让两位大文人失去了面对面交流的机会，那条河之大、之冰冷，真是让现在的人难以想象。

从24岁到44岁，人生最美好的年龄段中，从维熙所经历的坎坷与磨难，都被他写进了小说与纪实文学当中。这些文字灵感来源于真实的生活，通过一双勤奋的手，从维熙为读者留下了一个了解过去的窗口。同时，也反过来塑造了现实生活中的从维熙，他的不畏苦难，他的豪爽性情，以及晚年时还经常的歌之咏之，何尝不是在表达一种生命态度，如果中国也有“硬汉派”作家的说法，从维熙当算一位。

摆脱孤独是寻找自我认同的动力

储双月

“认识你自己”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人生最大的难题。当人进入知命之年，尤其是经历了无数次生死考验之后，会不知不觉陷入认知困惑和自我分裂。这时自我意识的认知变成了一种找寻，试图找到那个一直迷失和分离的自我。通过自我的觉醒，把自发的生存状态变成自觉的体验和认识，形成自我调节控制的心理基础，从而具备认识自己的能力。这样就能证明自己的真实存在，最终达到认识自我的目的。李安的电影《双子杀手》讲述了51岁、曾经杀过72个人的前国安局特工亨利，如何在跨入知命之年遭遇克隆人追杀，又如何陷入认知迷茫、平衡本我与超我的冲突，最终回归内心安宁的故事。

关于《双子杀手》的创作意图，李安在采访中这样说道：“如果说《卧虎藏龙》的李慕白，是我步入中年的一个检讨，那这次就是我步入老年，对人生的检讨……有的时候我们都越来越像克隆人。人到中年，甚至有时候比克隆人更像克隆人，日子过惯了，已经找不到真实的日子是什么样子的，就像亨利要面对的那种年龄困境——中年人不能退休，退休就要被杀……我想看一看时间究竟在人身上做了什么手脚。”克隆人小克其实反映亨利青年时的形象和心态，还原出一个真实的轮廓，最后使得亨利的一体两面领悟到人生的真谛、生存的意义和生命的本质。

从《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到《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再到《双子杀手》，都被李安以寻找身份认同的主题贯穿。《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展示了在这场认识自我的旅途中，少年派的心由此分裂成少年派和孟加拉虎的过程。孟加拉虎代表心中兽性的本能，这让派警觉并获取在大海上存活下来的力量。少年派同时

“

寻找自我认同的心理是人的本性需要所致。摆脱孤独是寻找自我认同的动力。通过自我的觉醒，形成自我调节控制的心理基础，从而具备认识自己的能力。这样就能证明自己的真实存在，最终达到认识自我的目的

信奉三种互排性宗教，在危难中超越了多神信仰，他的精神分裂最终在孤独的旅途中得到治愈。《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中的比利·林恩所在的B班因葬班长获得短暂的归国机会，他们作为英雄受邀参加一场橄榄球比赛的中场表演。比利·林恩面临“去”和“留”的抉择，最终认识到自己的归宿在战场，因为只有在伊拉克战场才能让他感受到自己真实的存在。

《双子杀手》中亨利和克隆人小克均由一人扮演，72个鬼魂似是化成魔鬼附在克隆人小克身上来追杀亨利，成熟的“我”与青春的“我”在灵魂层面得到深层次沟通，该片依然延续了寻找自我、发现自我存在的精神脉络。至于为什么始终纠结于自我身份认同，李安曾这样说过自己的经历：“在现实的世界里，我一辈子都是外人。何处是我家也难以归属，不像

有些人那么的清楚。在台湾我是外省人，在美国是外国人，回大陆做台胞，其中有身不由己，也有自我的选择，命中注定，我这辈子就是做外人。”李安身在异国他乡，始终像一个局外人，对自己所在群体及其文化找不到认同感和归属感。自我未来归属感认同不是别人给予的，是自己对社会的适应和积极调适。少年派在三种宗教信仰的挣扎中寻找存在于内心中的神性，比利·林恩在世俗社会的裹挟中失去自我的感知而回到战场，亨利退休后在与自我镜像追杀过程中认识自己。

寻找自我认同的心理是人的本性需要所致，也是因为人会感到孤独，与外在世界分离。摆脱孤独是寻找自我认同的动力。亨利在庭院、巷子、地下室三次正面认识克隆人小克，使亨利意识到自己并不孤单，有责任像父亲一样去启蒙自己的儿子，让冷酷残暴的他改邪归正。亨利正是通过纠正杀手小克人生观价值观的过程中摆脱了孤独，并不断自我反思，最后用父爱来完成自我救赎之旅。从技术层面上讲，李安凭借每秒120格、4K解析度、3D立体效果的拍摄，达到了现今世界上最先进的电影投影机的能力极限。他破除隔离“真我”的技术障碍，增强自我的真实感，提供逼真如人眼实际感受的视觉体验，带给观众身临其境的感受。这种制作和观赏电影的全新方式，让李安始终立于电影数字技术的最前沿，做未来技术的引领者而不是被迫淘汰者。但李安的技术控使《双子杀手》因刷力不足而遭受票房与口碑的双沦陷，技术上超前的优越感与无有后来者的孤独感并存。从内容方面可以说，亨利和小克新旧两代人由仇恨追杀、躲藏转变为相互凝视、唤醒，可视为是对李安的“父亲三部曲”的致敬。